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蒙默 蒙怀敬 编

廖平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蒙默
蒙怀敬
编

廖平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廖平卷/蒙默, 蒙怀敬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300-18878-2

I. ①中… II. ①蒙…②蒙…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廖平 (1852~1932)-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9973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廖平卷

蒙默 蒙怀敬 编

Liao Ping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39.5 插页 3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38 000	定 价	9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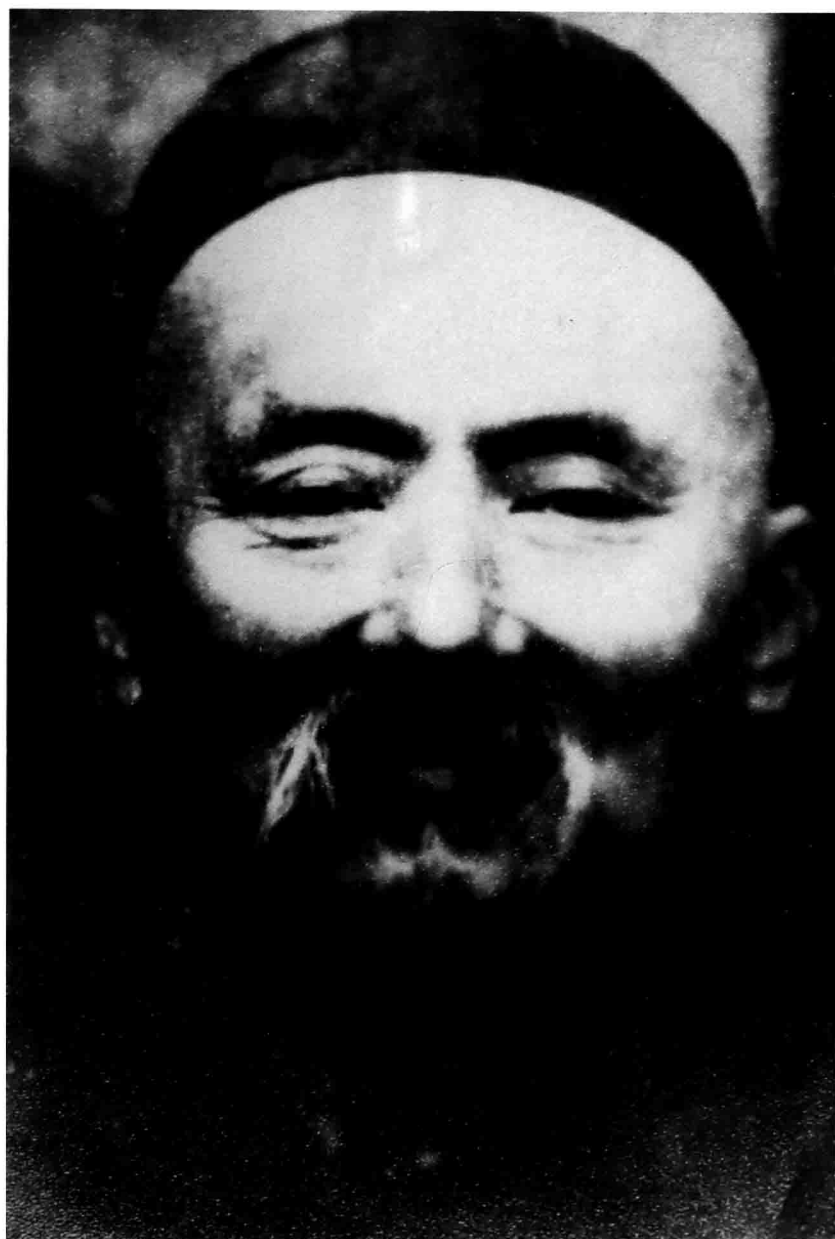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廖平



廖平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

导 言

廖先生名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清咸丰二年（1852年）生，家贫。1872年，年甫二十一，即设帐授徒。1874年，中秀才。次年，尊经书院立，择府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又次年，先生应科试，以优等补廪饩，调读尊经书院。1889年成进士。历任蜀龙安、绥定府教授，尊经书院襄校，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民国，任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1919年，病风痹，虽愈而偏瘫。1922年，辞国专校长职，两年后，返井研，1932年卒，享年八十一岁。终生从事教育治学，著述达百余种，以讲今文学著称。范文澜先生《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说：“始终专心讲论，堪称今文学大师的要算井研廖平”，是也。

（一）

先生逝世已八十余年，先生终生从事之经学研究，亦多年无人道及，而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忽渐有人研究先生，杂志上有文章论及先生，出版社有先生文集和评传出版，是先生尚未为学林淡忘，亦云幸矣。

各种作品对先生之学术评价颇不同，学术乃天下公器，见仁见智，各有自由。然有一说法颇令人难解。“廖平的经学六变，标志着经学到此终结。”（《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四变以后……往往荒诞可笑，正说明经学到了终点，这条路行不通了。”（《四川思想家·廖平》）“廖平的经学理论有着自己的意蕴，这就是无情地宣告了经学的终结。”（《廖平评传》）此种异口同声将先生与经学终结联系在一起之说，实为令人难

于理解。先生之学多变，后期愈变愈奇，幼眇难知，此先生之个人学术风格与思想方法，究与经学这门学科的终结有何内在联系？当时尚有被称为最后一位古文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名气比廖先生更大，又无廖先生之多变与幼眇，为何竟不能挽回“经学终结”（如果经学真的终结的话）？任何学术之产生、发展、变化皆受时代之制约，个人对学术之影响虽皆存在，但任何个人皆不可能影响某种学术使之“终结”，对廖先生给予此种评价，实毫无意义。

廖先生之学确为多变，后期尤为奇纵难知，遂致学人常因此而无法把握先生学术之核心。然先生多变之中有无不变者在？学者率多能以先生之言：“某毕生学说，专以尊经尊孔为主”作答。然此尊经尊孔之具体内核为何？则多茫然。其实，先生对此亦自有回答，先生《廖氏经学丛书百种解题·序》言：

……或曰：学已三变，安知后来更无异同？曰：至变之中有不易者存。故十年以内学已再易，而三传原编尚仍旧贯。唯大统各经以宗旨未明，不敢编定。名曰三变，但见其求深，初未尝削札。（《光绪井研志·艺文》）

先生于此明确指出：“至变之中有不易者存”。学虽三变而三传则其未变者。三传为三部大书，内容至为复杂，此“不易者存”之所“存”为何？《经话》甲编卷二言：

改制为《春秋》大门，自来先师多不得其意。凡《春秋》所讥“非礼”皆周制。《春秋》斟酌四代以定一尊，故即事见讥，以起改制之意。……

很清楚，《春秋》主旨即为改制。而《春秋》三传尤以《公羊》所言最多。《〈公羊补证〉凡例》言：

今于卷首刊《改制宗旨三十问题》以明旨趣……

此《改制宗旨三十问题》，《家学树坊》作《素王改制本旨三十题》，而在《公羊补证》刻本中则又改作《素王制作宗旨四十问题》，于此可知，“改制”与“制作”实为同义词。先生于《〈穀梁古义疏〉凡例》又言：

《春秋》改时制，所谓因监损益、择善而从。托之六艺，于时事无关。人多不明此意，流弊甚多，今于各条间辑周制遗文佚事，以见《春秋》改制之迹。

《春秋》虽以改制为主，然改制之事并不限于《春秋》。故先生又言：

经学以素王为主，受命改制乃群经大纲，非《公羊》一家之言，惟《公羊》盛行于汉，故其说独详耳。今以此为微言。（《群经凡例·〈公羊补证〉凡例》）

此处指出，此贯穿群经之“改制”，同时又被称为“微言”。吾人皆知，“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之特点，然“微言”者何？或释为：“精微之言”，或释为“隐微之言”，皆可。然“微言”之具体内涵为何？先生《王制学凡例》言：

孔子以匹夫制作，行事具于《春秋》，复推其意于五经。孔子已殁，弟子纪其制度以为《王制》。《论语谶》：子夏六十四人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即《王制》也。此篇皆改制事，不敢讼言；所谓微言，王即素王也。（《群经凡例》）

此处“制作”亦即“改制”之同义词（同前），“讼言”即“明言”、“公言”之意。此不能明言、公言之内容亦即改制。此处并言，改制亦不仅具于《春秋》，同时亦“推其意于五经”。故先生又言：“孔子修述六艺，其道则一，六艺皆孔子新订之制，迥非四代旧典。”（《群经凡例·〈四代古制佚存〉凡例》）《素王制作宗旨四十问题》又说：“改制为圣人微言，自明心迹”，“译改之制，全在六经。空言立说，非干预时政”。是“空言”亦即“改制”之言。《今古学考》言：“《论语》因革、损益，唯在制度”。是“因革”、“损益”亦皆“改制”之同义词。

在先生书中，“改制”或称“孔子改制”，或称“素王改制”，又或称“孔子素王改制”，其义皆同。先生又以孔子倡言改制乃受命于天，故又多作“受命改制”，或“受命制作”。《知圣篇》言：

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微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度，与今六部则例相同。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此义一立，则群经皆有统宗……

先生此文将“受命改制”在经学中之核心地位及其统领作用言之极明，苟能把握此旨以读先生之书，则欲通晓先生之学固非大难矣。

（二）

改制为廖先生经学思想核心之义既明，则将进而考察廖学六变与改

制学说之关系。

先生言经初变之学为“平分今古”。盖经学以汉代最盛，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而经学独居学术统治地位。至西京之末，刘歆倚王莽之势于平帝时增立《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四博士。然莽末丧乱，诸家博士皆不存。至东汉中兴复立学官，歆学四博士未得复立，虽数次争立，皆未如愿。然其学大行民间，世称古学。而立于学官之今学十四博士则日益衰微，魏晋而后，两京博士之学殆成绝响，唯《公》、《穀》二家偶见子遗。由行世而立于学官者皆为古学。嗣经学中历衰落者千数百年，学者竟渐不复知有“今、古”之事，“微言大义”之旨亦不复明。故先生以分今古为两千年不传之绝学。至于清代，经学再盛，然亦不知今古之别，乾嘉汉学鼎盛，常州有庄存与者，喜好《公羊》，著《公羊正辞》，专求微言大义，不事训诂名物，与当时戴段显学大异。然尚不明家法，同时犹治《毛诗》、《周官》。其从子述祖始略知今古之说，传学其甥刘逢禄，逢禄尝言：“后从舅氏庄先生治经，始知两汉今古文流别。”所著有《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左氏春秋考证》，颇为学者所重。庄氏另甥宋翔凤亦从庄氏学，著《汉学今文古文考》、《拟汉博士答刘歆书》等，以反对古文经学，于是今文之帜乃张。庄、刘、宋皆常州人，而常州学派之名遂扬于远近。刘弟子龚自珍、宋弟子戴望并善说《公羊》，其后魏源著诗、书《古微》，《公羊春秋论》，皆以讥刺时政、经世致用为归依。而是时国事日非，今文之学乃日昌，尤以南方各省为盛。此清世今文学兴起、发展之事，近世学者类皆能详。廖先生为晚清今学之殿，然于常州之学无与，对其影响最大者为张之洞，然张非学人，导其治学之启蒙而已。后湘潭王闿运来长尊经书院，“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王初来，先生从王治《公羊》，乃知今古事，殊不久即与王不合，次年转治《穀梁》，时在1880年，当年即纂《穀梁先师遗说考》四卷。次年，为《穀梁注》，成书八卷，1884年改为《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十一卷，嗣编定《穀梁春秋内外编目录》三十七种，都五十卷。先生治《穀梁》专明大义、求古说，分别三传异同，于是乃见家法之事，遂能度越前贤成一家之学。先生以治《穀梁》读《王制》，见《王制》与《穀梁》所载礼制无有不合，乃悟《王制》于治经之重，嗣治《王制》，时引《穀梁》以相印证，偶参《五经异义》，见其多载今古制度异同之事，乃作《〈异

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于是乃著为《今古学考》。前此之言今古者，虽论争数十年，皆未知其立异之根本所在。学者或以文字为说，于是有“今文”“古文”之名，实则今古家之五经文本并出古文，所异者个别文字耳，故以文字论，则或今与今不同，古与古不同，此显不足以别古今之为异派。学者又或以是否立学官为判，而不别义例，则更不足训。先生据许、郑《五经异义》，所载几尽礼制，故先生言：“今古之分以礼制为主”，“不在异文”。“今古礼制，以《王制》、《周礼》有明文者为正宗。”《学考》刊出三年，先生过苏州，谒当时古文大师俞樾，樾亟称“不刊之书”。人民国，古学大师章太炎亦言：“井研廖平说经，善于分别今古，盖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所不能上。”“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别今古，确然不易。”（《程师》）刘师培先生亦古文大师，“方其作《王制集证》，犹不信有今古之分，及既接廖氏，晚成《周官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遂专以礼为宗”（《经学抉原》）。而先君子又言：“先生依许、郑《五经异义》以明今古之辨在礼制，而归纳于《王制》、《周官》……平分江河，若示诸掌，千载之惑，一旦冰解。”后之学者“胥循此轨以造说，虽宗今宗古之见有殊，而今古之分在礼，则皆决于先生说也”（《廖季平先生传》）。近世以来之论清代经学者，莫不述及道咸以后之今文学，虽其评价有殊，其今古并论，则莫之能易也。然学者中亦似有持异议者，钱宾四先生在其《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中言：“本书所收四文……皆为两汉今古文问题，其实此问题仅起于道咸以下，而百年来掩胁学术界，几乎不主杨、则主墨，各持门户，互争是非，渺不得定论所见，而夷求之两汉经学之实况，则并无如此所云云也。”“盖今古文之分，本出晚清学者之偏见。”先生此语，含义模糊，把握为难。或据先生此言，谓：“可见，钱先生认为两汉经学本无今古文两派之争的事实。”余以为，如此理解未必符合钱先生之本意，盖先生于《自序》中使用“门户之见”及“门户之偏见”二词，二词含义显不同，不可混淆。首言“门户”，古言“门户”犹今言“学派”、“派别”。此为古今事实之不可避免者。学派、派别之不同，则其对某事物之认识、理解亦必不同（或不全同），认识、理解不同，其见解亦不同，此可谓“门户之见”，此亦不可避免者。然由于门户不同、见解不同，而又掺和“标新

立异为自表褻之资”，杂以门户意气之私，此等见解则为“门户之偏见”，此则处于可避免、不可避免之间。而余则认为：门户之偏见不可有，门户之见不能无。不可因门户之见而滋生门户之偏见，亦不可因门户之偏见而否定门户之见。余读先生《自序》，揣其本意，当谓：晚清经师，无论主张今文经师之所说，抑主张古文经师之所说，皆不可信。盖其今古文之分，本出于今（古）文学者门户之偏见。其间杂有“标新立异为自表褻之资，而又杂有门户意气之私”，所说都不符合“两汉经学之实况”，故“同样不可信”而非“两汉经学本无今古文两派之争的事实”。苟谓余不信，请共读钱先生《两汉博士家法考》一文。

世俗所称两汉经学中之“今文学”、“古文学”皆为误以其起源于文本之为“今文”、“古文”，此种误解早已为学者辨明（龚自珍、吴汝纶皆有文），实当弃置毋论，然此名沿用已久，学人皆心知肚明其实指当为“今学”、“古学”，可毋庸置辨。钱先生对此亦知之甚悉，于文中亦言之至明。先生文中明确指出：文字之古今，“本不为当时所重，当时辨学术分野，则必曰‘古学’、‘今学’，不称‘古文’，‘今文’”。又言：“‘今学’、‘古学’之辨，此东汉经学一大分野，亦不可不知也。”二学分野既大，且今学虽立学官，而古学则朝野并盛，则二学之争势所难免，故钱先生文中亦特立有“白虎观议奏与今古学争议”一节，专论其事。其他数次争论，文中亦皆略有道及。由此不难见出，钱先生必不会在《自序》中提出与经过修订而汇刊之论文中相反之论断。对钱《序》作“两汉经学本无今古文两派之争的事实”之理解，显为误解。此误解之产生，可能因钱《序》措辞有欠准确明白之故。

廖先生分今古之学，盖上承汉末两千年不传之绝学，竭二十年之力扶而复之，使儒经微言大义之宗旨复明于天下，故学者多赞之，以之比于顾亭林之发明古音、阎百诗之攻《伪古文尚书》，“专精《王制》，恢复今古旧学，虽原本汉人，然其直探根本，分晰条流，规画乃在伏贾之间，西汉以来无此识力。以之比于顾、阎二君，未审何似”（《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萧藩跋）此言是也。先生之分今古确为经学历史之一大贡献，然仅就“平分今古”以尊先生，远不足以尽先生，盖平分今古只为经学之一学派问题，乃其表层意义，而分今古之深处，则更有经学思想之精微者存焉。先生之分今古盖基于礼制，而今古之礼制则显然大异，廖先生言：古礼为周制，今礼为新制，“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而改制之说创焉。《今古学考》